

陈福桐先生

荣
哀
录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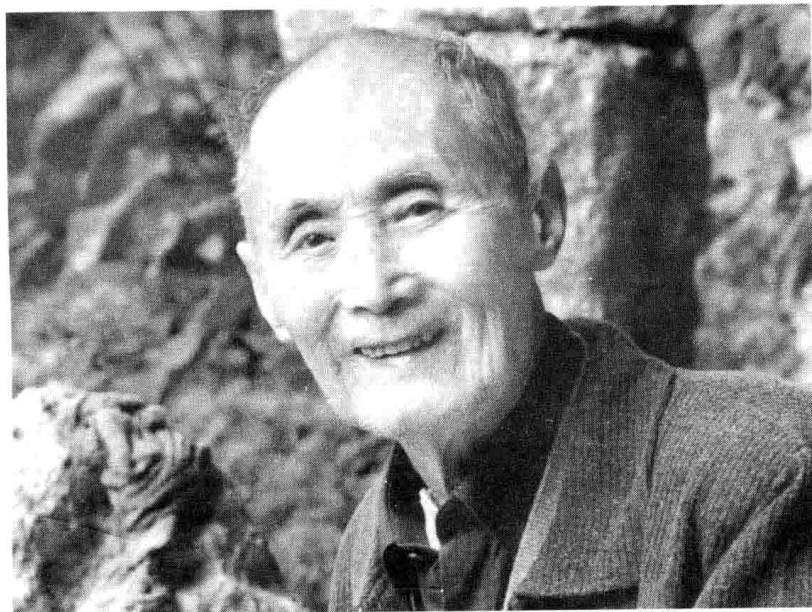
2010 年 7 月 27 日

陈福桐先生

荣
哀
录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2010 年 7 月 27 日



陈福桐先生遗像

文章深处有司马；
灵爽千秋随令威。

目 录

陈福桐生平简介	(1)
---------------	-----

亲切而永久的回忆

晚钟出谷振大音	贵阳	刘学洙	戴明贤	史继忠	(6)
遥望黔山忆福桐	陕西	张	洪		(11)
虽九死而犹未悔					
——悼陈福桐先生	遵义		石永言		(15)
忆陈福桐老先生二三事	遵义		龚雨高		(18)
逝者长已矣,生者念悠悠!					
——深切悼念文化老人陈福桐	遵义		朱正纲		(20)
思念远去的老人	遵义		李永颐		(22)
悼忆陈福桐先生	松桃		黄前进		(24)
十年文史忆恩师	贵阳		庞思纯		(26)
缅怀陈福桐先生	贵阳		李守明		(29)
斯人已逝,翰墨永存					
——追忆陈福桐先生为福泉的最后题词	贵阳		王羊勺		(31)
如何开展对陈福桐的研究					
——以此纪念已经辞世的这位世纪老人	北京	帅	好		(33)
陈福桐先生百日祭	贵阳		陈德谦		(35)

悲恸而深情的怀念

挽联	(38)
挽诗	(44)
编后语	(49)

陈福桐生平简介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史学家陈福桐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17日14时在贵州省中医一附院逝世，享年93岁。

陈福桐，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1917年11月21日生。幼读私塾，后入小学，15岁时读初中，1935年毕业于贵州省立遵义中学。1937年赴上海读书，后因抗战爆发，回遵义任教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自修大学文科，并与中共遵义地下组织的同志一起创办快读书店、青年抗日救国会、音乐教育促进会、农村抗日宣传队等，后还与社会人士参办《黔声日报》、《民铎日报》（任主笔）及《遵义国民教育杂志》（任主编）、《时代儿童》等刊物。1944年任遵义老城标准学校校长，豫章、玉锡两中学语文、历史教员。1948年被捕，关押在贵阳一年多。1949年10月接受解放军二野联络员委托，从事迎接解放工作。同年11月，遵义解放后进入遵义军分区政治部联络处，从事联络工作。1950年任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1年任贵州省文联秘书。1953年参加土改回来，任《贵州文艺》编辑。1954年后历经磨难，“文化大革命”中遣送农村。1976年任省文联行政组负责人。1979年参与恢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建制工作。1980年参与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及贵州业余书法学校，同年任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成员。1983年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任副总纂，为全省修志事业，跑遍全省所有地州市县和省直各个部门，对修志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宣传修志，发动修志。曾任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校阅各种志书70余部，审读人物传记上千篇，培养扶持修志后学。同时还与一些老领导、老专家一起倡议成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诗词学会，并任常务理事，为贵州地方历史文献、传统诗词的整理、研究、创新出谋划策。参与全国文史馆系统《新编笔记丛书·贵州卷》和《黔故谈荟》的编辑。1991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93年从文史馆退休，继续从事整理历史文献、点校古籍及参与编辑《黔灵丛书》等佛学书籍的工作。

数十年来,共创作古诗词 1000 余首,辑为《梧山诗稿》,又把研究评论方史志文章辑为《十年修志文存》、《梧山文存》。另,发表贵州名贤专论文章如《封疆大吏典范——丁宝桢》、《黎庶昌——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及诗词方面的论文《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等,他的著作《龙山吟》、《梧山文稿》已由省文史馆印行。序跋五十多篇、记叙文字数十篇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结集为《晚钟出谷》一书出版。有古风一首《古诗新趋向》参加全国第一次诗词大赛,以图寻找诗词创作新思路,列入大赛金榜集。亦从事传统书法的创作和研究,省内一些风景名胜、寺院庙观阁均有其墨迹。

陈福桐先生被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以其大度、包容、严谨、渊博、爱才而享誉学术界。亦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著名无党派人士。正如刘学洙先生所说,文化老人之称号,体现出的不仅是德高望重,还有文化贡献,文化担当。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份贡献与担当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始终不离不弃,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始终心怀乡邦。陈福桐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品格,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担当起了复兴乡邦文化的重任,对贵州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山石般的崇高精神与贵州仁人志士共同铸就了黔中山石文化之魂。

陈福桐先生晚年事业最闪亮的地方,是他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和所产生的积极广泛影响。陈福桐先生以他对贵州文化的深刻理解,推出了一系列弘扬贵州文化的大文,很快引发了省内外文化界广泛的共鸣与认同。陈福桐先生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不浮在表层,对贵州文化的源流、演进、脉络,常以历史纵深的大视角作有说服力的分析。又以学养深厚,见识深刻,能够抓住本质,行文汪洋恣肆,显得雄辩滔滔,令人敬服。

陈福桐先生是有传统思想,有科学民主意识,但身上更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美德。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受儒家精神的熏染很深,这从他的立身行事可以看出。身处逆境十余年,但坚信党的领导,始终体现“爱国”二字,忧国忧民,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读书不辍,行医治病。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儒家关心国家民生、追求道义的仁爱精神。作为一个文史馆员,终身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救国救民奋斗,为中国共产

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表率。同时心系文史馆,关心文史馆的建设与发展,为文史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党内外朋友,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各方面的负责领导,到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以及地州市县乡镇的乡土人才,农民朋友,都愿意与他交流,谈古论今。他的家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居室,却成为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文化交流之所。有诗赞曰:“心怀儒家道义心,肩担乡邦文化任。砺砺坎途百不挠,铸就黔中山石魂。”可作为陈福桐先生一生精神之写照与一生理想之追求。

陈福桐先生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对子女从严管教,严格要求;对单位同志和蔼可亲。陈福桐先生的逝世,是我省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长辈。我们深切悼念陈福桐先生,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传承贵州传统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福桐先生安息吧!

(本文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代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在陈福桐先生告别仪式上宣读)

亲切而永久回忆

晚钟出谷振大音

贵阳 刘学洙 戴明贤 史继忠

我省德高望重的文史学家、诗人、省文史馆馆员陈福桐先生，走完他那93岁不平凡的人生，于2010年4月17日14时，因病抢救无效，溘然离开人世。病危时，省人大、省文史馆领导同志，文史馆老同志及陈老的门生知友闻讯先后赶到医院探视，只见老人戴着吸氧面罩，两眼无神，喃喃不能言语。当家人贴近他的耳边告知哪些人前来看望时，他面部微动，神志尚清。陈老子女告诉我们，老人日前留下遗言说：改革开放30年是我一生最称心最顺意的30年。我干干净净地来，也干干净净地走。我把全部精力都献给贵州文史事业，可以含笑而去了。身后，我的书房原封不动，将向省文史馆和文史界同仁开放，供他们查阅图书资料。我的丧事一切从简，不收任何奠仪，让我安安心心、清清静静地走……。听到老人这些嘱咐，我们心潮起伏，想起近30年来追随先生门下亲炙老人熏陶指点，受益良多，历历往事、不禁涌向心头。

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他的文化贡献与文化担当负起了复兴乡邦文化的重任

老人终于走了，我们翻出他去年5月亲笔题赠给我们的《晚钟出谷》，这是他自选30年文稿由贵州教育出版社《我的贵州丛书》推出的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书名出自清代西南大儒、陈老遵义家乡先贤郑珍《巢经巢诗钞》的诗句。打开扉页，再读陈老的《书前语》，仿佛聆听他平时洪亮而有韵律的声音：“贵州各族的先辈艰辛地创造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遗金满地，我才多少拾得一点，而年已入日薄西山之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诉之笔端，成此一书，留下人生一段痕迹，请阅者指教”，想不到，这些话竟成为他向文史界留下的最后心意了。

记得，在陈老进入93岁高龄之际，2009年12月3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召开过一次“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的社会价值”研讨会。省人大副主任、

省文史馆长、著名学者顾久主持研讨会并作了主旨发言,他说:“陈福桐先生怀着对贵州的敬畏之情,以守住尊严的气魄,挖掘贵州鲜为人知的文史,扬贵州之风貌,展贵州人文之精魂。他是一位高扬爱国主义之旗,把学术当作生命的公共学者。”

那次会上,一位省外中青年学者帅好先生也发了言,他作为外省人两年来自告奋勇,搜集、阅读、分析、解读陈福桐。今年春天完成课题后已离黔京。当时贵州日报《影响力·人物》专刊报道了他的发言片断:——

“世纪学者陈福桐,一生历经各种覆顶浪涛,顶住铺天盖地的各种势力,积淀来的珍稀品格,达到了陈寅恪们独立自由的沉静境界。逝去的年代里随风飘散的人文传统,竟意外在被流放的世纪学者体内生了根,表面和内心均没有向专制低头。更为可贵的是,在获得相对自由重回人间之后,他对社会所表达出来的言行,一如既往,饱含着原初的勇敢、智慧和大爱。他是由一个民国乡间热烈的知识人,成长为今日社会公民的世纪标本。”

这次研讨会上,顾久、帅好一老一少的言说,都有大量事实支撑,把对陈福桐的研究,从文史成就的层面,提升到人文心灵的深度与文化的社会公共责任高度了。

在19日上午向陈老告别仪式上,顾久代表省文史馆作《陈福桐先生生平简介》指出:“陈福桐先生被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活辞典,以其大度、包容、严谨、渊博、爱才而享誉士林。他的文化贡献与文化担当,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始终不离不弃,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始终心怀乡邦。他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品格,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担当起了复兴乡邦的文化的重任,对贵州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山石般的崇高精神与贵州仁人志士共同铸就了黔中石文化之魂。”这是对陈老的公正精当的定评。

他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剑心侠骨本儒士,满腹经纶非书生

回溯20世纪80年代初,当先生历尽劫波,登上贵州志坛,迅即大展风采之时,早已年过花甲了。这位20世纪40年代曾在黔北为贵州解放事业从事地下进步活动的民主老人,从儒士到斗士,又从斗士到儒士,人生多姿,颇富传奇色彩。而无论从政从文,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是独立特行,大气磅礴。当形势需要,他投笔从政,则凭借自身声誉与多层人事关系,在恶劣环境中,机智多谋地与旧势力周旋,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抗日时期,他就与中共地下组织同志一道创办进步书店和青年抗日救国会等。解放战争后期,他是遵义地下革命力量武装斗争和迎接解放的重要参与者。在白色恐怖下,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而解放后,却遭左祸又坐了新社会的监狱。两个时代,两种截然相反的罪名:国民党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说他是国民党。但是,陈福桐都能笑傲江湖,自立自持。1971年他被遣送流放于安龙县龙头山下劳动期间写下的《龙山岭》诗词,有句云:“回首三十年来,壮心犹存。倚马可挥笔,疲骨嶙峋仍啸傲,走尽峰回路折。”这是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迹留痕。陈老的嶙峋瘦骨是压不垮的。由于他历经这样曲折,练就坚韧品格,所以到了晚年,躬逢盛时,凭借数十年饱读经史、深谙社会的大根柢,以开放眼光与现代意识,重新整理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往往发人之所未发。他是社会活动者,又保持书生本色;是一介书生,又非只知钻故纸堆的迂儒。他的生平,我们曾用“剑心侠骨本儒士,满腹经纶非书生”两句话来概括,似乎颇得文史界认同。

他把从事修志看作是接受一种历史使命,担当一种社会公共责任

陈老把修志视作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后他痛感左的错误让广大人民深受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之毒,因此他把自己平反复出后从事修志看成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公共责任。他曾动情地向从事修志的同仁说:“司马迁忍着极大的腐刑的痛苦与耻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承先启后的责任感支持他完成了《史记》巨著。我们读《太史公自序》,读《报任少卿书》,直觉得司马迁思想的地层里像有团热烫烫的岩浆在冲突,激荡,终于从一个火山口迸出震惊大地的火花,这就是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史记》。司马迁爱民族、爱国家的感情也都充满在每一篇的字里行间。”(见《修志从业十题》)这些话,也可看作是陈福桐的向往与自勉,他从事省志修纂工作,不是接受一种工作指派,而是接受一种历史使命。1980年,贵州省成立省志编写筹备组,不久,他出任省志副总纂,在近十年缺总纂一职的情况下,全盘主持修志编务。13年间,他走了全省70个县,对修志工作进行精心指导;多次开办培训班,口授身传,热情扶持后学;校阅各类志书100多部,审读人物传记上千篇,吟写游历各地纪事诗200余首,创作方志论文、序跋、书评二十多篇,堪称煌煌大观。退休后,他还参加萧乾主编的《全国文史笔记丛书·贵州卷》与《二十四史贵州资料辑录》的编写工作;参与点校(民国)《贵州省志·人物

志》、《黔南会灯录》、《黔灵山志》等古籍；自选《梧山诗存》、《梧山文存》、《修志文存》三部书稿。凡此种种，均以耄耋之年完成之。据我们亲身体会，多年来陈老仍然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即日可就，而文字之新鲜活泼，真不像出自高龄老翁之手。

先生晚年更为精彩的亮点是他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再总结

先生晚年事业更为精彩的亮点，是他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和所产生的积极广泛影响。20世纪8、90年代，全国性的文化热迭起，贵州文化研究也成为兴黔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陈老以他对贵州文化的深刻理解，推出了一系列宏扬贵州文化的大文，很快引发了省内外文化界广泛的共鸣与认同。他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洋洋洒洒数千言，语惊四座，令人耳目一新。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执着精神，从浩繁的史料中爬梳，整理，发现明清两代543年间，贵州产生过6000多个举人，730多个进士。而且个个有名有姓，有县份籍贯，有职位。这个发现，立即引起各界强烈反响。其实，科学研究并不一定都需鸿篇巨著，有时一个独到见解与发现，对人们认识上的突破，往往比因袭前人窠臼无所发现无所发明的高头讲章作用更大，这篇《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便是好例。多年来此文之所以一直为人传诵，流布甚广，在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上有某种振聋发聩之功，就是因为他只提出的两个数字，就雄辩地一扫贵州无文化的成见。这个事实本是客观存在，但一直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从未引起注意，而一经陈福老抉出，立即一箭中的，石破天惊。难怪有人称它为贵州文化史的一次“哥伦布发现”。

陈福桐先生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不仅仅浮在表层。他对贵州文化的源流、演进、脉络，常以历史纵深的大视角作有说服力的分析。在《从认识贵州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来理解贵州》这篇论文中，他回溯贵州历史沿革与贵州文化，指出在15世纪时，贵州版图小，人口少，交通闭塞，民族复杂，经济和文化都落后，实在不够建为一个省的条件。但是这块地方名曰西南边徼，蛮荒之区，它却是西南边徼的中心地带。从战略意义上说，有犄角西南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建贵州省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建省以后，中央那一套行政系统，那一套军事设置，那一套教育计划，都因地制宜地在贵州作了部署。派来的封疆大吏、学政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多属有学识、有胆略、敢于万里投荒建功立业的人。这个事实是必须重视的。有了这个事实，所以，才有明清以来贵州的初始开发。陈福桐回溯这段历史，语言平实，深入

浅出,令人信服。他以古证今,是希望当今主黔政者以及中央决策层能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开发贵州的规律性之道。

陈老把黔诗、地方志、禅学与民族诗歌列为贵州文化几大特色。他在“贵州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作过《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的学术发言,他认为,一代诗风的形成,一群诗人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就因为有了诗歌,才反映了文化的演进和灵魂的形象化。一部《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汇集了自明至清以来贵州诗人的成就。他对贵州历代诗人如数家珍,对黔诗名篇常背诵如流,而且深得其精神。他研究了明清以至民国贵州诗家群体,并分别对主要诗家与流派作了深刻评价。他的论文往往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他还引用曾国藩、梁启超、陈衍、章士钊、钱仲联等国内诗论权威对黔诗及若干贵州诗人的高度评价,用以观察贵州 600 年诗史。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与鲜明的科学民主现代意识结合

陈老是一位道德与文章交辉的人。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又具鲜明的科学民主现代意识。无论从政,还是从文,他都是形端影直,宽厚仁德,耿介独立,从不随风媚俗。这里我们不禁忆及一事:20 世纪 80 年代初陈老曾支持福泉县志办负责人黄恒德,对建国初期定为“平越反革命纵火案”疑案进行调查。事隔 10 年,县志办为此案中被处决的国民党要员谭克敏、中共地下党员张正光等人写了传。但当时此案尚未通过法律程序平反,县志负责人征求陈老先生意见时,他不作明哲保身的谦谦君子,当即勇敢站出来,以个人名义给县里写信明确表态,建议可以为三个知名历史人物立传,可在传末对旧案作客观交代,今后如正式平反,仍可在新修志书中补充说明。陈老的信经县志办复印给县委县政府领导,他们均同意。后来,陈老据此经验,在处理其他地方志类似疑难问题中,参照办理。2000 年,“平越纵火案”在历届省委重视下,终经司法机关复查宣布平反,谭克敏、张正光等人公开恢复名誉。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证明陈老有胆有识有原则,陈老的这种治史风骨,鲜明体现了做人的尊严。

郑珍诗云:“晚钟出谷何处寺,落日耕耘谁氏田?”陈老虽然走了,然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那出谷的晚钟,大音悠扬,将长久留在人间,成为贵州文化界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将继续浇灌贵州文化原野的沃土肥田!

遥望黔山忆福桐

陕西 张 洪

4月28日,突接思纯从贵阳打来的电话,说陈福桐老先生已于本月17日去世,错愕之余,悲从中来……

在我心中,陈老早年虽然历经磨难,却祸得福,在与磨难的抗争中,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健康的体魄;且他一生淡薄名利,与世无争,心态平和,宽厚待人,既不忧心家事,又无病痛困扰,加之精通医术,深知养生之道,故他虽已93岁高龄,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尤其是那手中的妙笔,常令人钦服。古人云:德者寿。我想:陈老能登百年之寿是没有问题的。他悄然辞世,的确令我始料未及。我忍住悲痛,走到窗前,南望遥远的黔山,早已逝去的往事又浮在眼前……

我与福桐相识于1953年,那时他在贵州省文联任《贵州文艺》编辑,我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身份兼省文联秘书长及党组书记。开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觉得他是一个为人低调的“白面书生”,不苟言笑。每天吃过晚饭后,人们或去跳舞,或去看戏,只有他一人呆在办公室看书、练字。不过,我与他也有接触的机会,那就是每月初,他会将当月《贵州文艺》的拟用稿编辑好后送我过目。每当这天,他事先将自己对每篇稿子的处理意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地写在审稿单上,意在让我看后明明白白,无须多问。当我首肯后,他立即回身拉上门走了。

不久,遵义市的乡土文学作家石果调到省文联创作室工作,从他口中多少透露出有关福桐解放前后的一些情况。以后,有人告诉我,福桐在抗战时是遵义市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办过进步刊物,教过书,是全市文化界与教育界的名人。后来,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斗争,还被特务机关逮捕后投入贵阳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不过,也有人说他“社会关系复杂”,有些说不清的问题,劝我务必提高警惕,多加防范。“福桐的社会关系到底有多复杂?”此人不肯明说。我亦不便多问。不过给我敲响了警钟:“文化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1954年夏,省委组织部抽调我去重庆的中共西南局工作。一天晚上,我正在整理行装,突然福桐敲门进来了。他不邀而来,令我非常意外,出于礼貌,遂请他坐下。福桐见室内杂乱的状况,毫无局促之感,儒雅大方地笑道:“其实没有什么事,只是听说你要调走了,想找你聊聊。不知你欢迎否?”

我当然表示欢迎,但对其所说的“聊聊”有些疑虑。令我有些诧异的是,今晚的他与平时判若两人,神情开朗,举止大方,平时矜持自抑的表情荡然无存。

福桐在床边坐下,轻声问道:“你了解我吗?”见我摇头不语,他又问,“你相信我吗?”

我直望着他,揶揄地反问:“你又相信我吗?”

他坦诚地笑道:“我若不相信你,就不会深夜造访了。”

“为什么相信我?”我正色地问道。

福桐胸有成竹地说道:“经过对你一年多的观察,发现你能平等待人,从不对任何人声色俱厉,装腔作势。”

接着福桐向我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解放前后的革命经历,尤其提到遵义解放前夕,他在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员的委托下,积极开展护厂护校斗争,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在此期间,他还通过许多关系,促使陈铁、王家烈、柏辉章等8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由于对遵义和平解放有功,福桐被军管会任命为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当我告诉他“这是政府与人民对你的肯定”时,福桐却十分痛苦地说:“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有人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甚至怀疑我是出卖革命的叛徒。对此诬蔑,我苦闷万方,有口难辩……”

我安慰他:“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坐得正,行得直,大可不必把这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当然,你也不要消极等待,应积极向党组织说清楚。”

“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你过去见我总是躲躲闪闪的,可能你不信任我吧?现在你要走了,我不得不向你说了。”

“如今才说,似乎晚了。”

“其实不然,正是时候。”他见我有些困惑,立即解释道,“现在人言可畏!我过去所以不主动找你,是不愿意连累你,如今你要离开贵阳,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